



86年前,这家兵工厂从广东迁来重庆 抗战时期为中国战场 造了4000门火炮

□杨耀健

在中国近现代兵器工业史上,重庆有一家军工厂地位较为特殊,它为抗战的胜利,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这就是位于重庆江北郭家沱的望江机器厂。这家最初从广东迁来重庆的军工厂,抗战期间为中国战场提供了4000门火炮,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1 生于羊城 长于山城

重庆望江机器厂的前身为广东第二兵工厂,简称粤二厂,是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为了搞武装割据,1933年与德国公司签约,委托莱茵炮厂筹办的一个制炮厂,位于广州附近的清远县濠江口。这也是当时全国兵工厂中最现代化的工厂。

1936年,该厂尚未全面投产,陈济棠就被蒋介石打垮。当年11月,南京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接收了该厂。由于它是全国唯一的火炮制造厂,当局非常重视,拟定扩充计划,仍交德国公司承办。因抗战突然爆发,机件大部分未能及时交货。

抗战初期战局不利,东南沦陷,沿海告急。1938年春,粤二厂奉命迁往重庆,迁建队将机器设备紧急装车,工具一件不留。粤二厂刚搬迁不久,原厂址即被日军飞机炸毁,着实惊险。

这次搬迁计划周密,分设联络处、通信处,先将物资从广州通过粤汉铁路运到湖南株洲,再通过船只改走水路,经洞庭湖水系进入长江,于年底前到达重庆,历时数月。原粤二厂的技师和熟练技工600余人,也响应抗战号召迁往重庆。

重庆这边,工务处在长江下游铜锣峡外郭家沱山沟,劈山平地建厂。战时物力艰难,基建因陋就简,就地取材。主要厂房为砖木结构。员工宿舍大多以砖柱为支撑,以竹片、木片外涂三合土为墙面。短短两三个月,荒山野岭里就建成了成排建筑。机器陆续运到江边,没有起重设备,全靠滑轮、杠杆等原始工具,用人工搬上半山腰。

搬迁到重庆的粤二厂按兵工厂序列,改名为“第50兵工厂”。厂内生产单位按产品种类划分,分别成立了制炮所制造火炮,弹甲所制造炮弹,引信所制造引信,火工所负责装填火药。还有工具所、铸工所、锻工所、木工所等几个辅助单位。为加强“50厂”的科技实力,兵工署下令将从南京白水桥迁渝的兵工研究所主要部门划归“50厂”。

白水桥研究所下设计量研究所、样板厂、材料设计实验室。计量研究所终年保持恒温,有利于校正量器。样板厂制造所需的标准样板,为制造武器、零件打好基础。材料实验室分析兵工材料的物理性能。该所迁到重庆后,计量研究所和样板厂设备,全部归第“50厂”安装使用。材料实验室则改称材料试验所,作为兵工署附属研究机构,在磁器口附近另建所址。

“50厂”的第一任厂长是江杓,上海人,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,兵工专家,前任任兵工署技术司设计处处长。考虑到人才匮乏,他指名索要丁天雄、李式

白、王国章、何家俊、萧宏动、唐宏庆、陈慧新等人到“50厂”供职,这些人不是德国留学生,就是同济大学毕业生,均受过正规教育,有知识、有特长。为培养新生力量,“50厂”还在成都开办技工学校,录取学员。

2 仓促上马 支援前线

当时,日军还在继续推进,并于1938年10月攻占武汉,窥视宜昌。前方战区急需火炮,告急电接连不断。当务之急,当时唯一的火炮厂“50厂”必须尽快生产火炮。

“第50兵工厂”的制造能力,限于德国供货商按合同提交的器材,大的锻件,包括炮管等主要部件,由德国供应毛坯。至于精密件瞄准器,则由德国供应全套成品。当时的中国重工业落后,国内钢材不符合造炮标准,进口材料已经用完,“50厂”无法及时投产。通过军政部发文,才在全国各地军械库搜集到一批早已废弃的150毫米迫击炮炮管,可作代用材料,紧急调运重庆。“50厂”据此设计了一种153毫米迫击炮,炮架带有缓冲装置,比较新式。前后生产了100多门,并设计了新的迫击炮弹。这也是“50厂”生产的第一种产品。

根据前方将士反馈,日军坦克、装甲车来势凶猛,急需战车防御炮。在建设新厂的同时,1938年5月,“50厂”派工务处长李式白、技师王运丰去德国订购生产100门37毫米战车防御炮所需材料及补充机具。经过一年多时间,材料和毛坯才运到重庆。1941年春,第一门样炮告成,试验合格,准备批量生产。从8月起,每月可生产2门,后经技术攻关,产量逐月增加,可达月产5门,共制造了100门“三七炮”。

1941年3月,丁天雄出任“50厂”第二任厂长,他也是留学德国兵工专家。当年夏天,“50厂”奉命试制60毫米迫击炮,丁天雄亲自担纲,带领由专家组成的设计组,参照法国布朗特式迫击炮全套设计图样,自制样板工具,同年秋试制成功。60毫米迫击炮每分钟发射18发炮弹,最大射程约1500米,重量仅18公斤,单兵可携带,成为中国军队克敌利器。1942年7月批量生产,可月产100门。

炮弹方面,“50厂”先后设计制造75毫米野炮弹、三八式野炮弹,以及150毫米迫击炮弹等。又将成都技工学校改为分厂,专造60毫米迫击炮弹。

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,切断了中国对外通道滇缅公路,外国器材断绝。“50厂”

依靠回收损坏炮具和国产钢材,继续制造60毫米迫击炮。

在1940年到1942年的宜枣战役、中条山会战、第二次长沙会战、第一次缅甸战役中,“50厂”生产的153毫米重迫击炮、37毫米战车防御炮、60毫米小型迫击炮,给日军造成了较大伤亡。日军根据情报判定,中国在抗战前和抗战初期进口的德国、苏联、英国火炮已基本被摧毁,不可能得到补充。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,在重庆还有一个“50厂”在向战场源源不断提供火炮。而且,迁到重庆的“第21厂”“第10厂”也能够制造火炮。

3 偏僻山乡 生机勃勃

“50厂”搬迁到郭家沱,也给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山乡,带来了百年不遇的机遇。

郭家沱的山民全部有了职业。力气大的,当上了搬运工;力气小的,则坐在树荫下捆扎钢筋。妇女和小孩每天往工地上送三顿饭,回来的时候,兜里总是装着父亲或丈夫挣的工钱。厂区建起简易公路,一直通到江边码头,上面日夜行驶着既不吃草、又不晓得休息的铁壳怪物,人们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叫汽车。从广东带来的4台柴油发电机,每台可发电250千瓦,照亮了郭家沱沉睡千年的夜空。从来没见过电灯的山民,以为那是“小太阳”。

“50厂”员工常年保持在4000人左右,员工加上家属,总数有2万多人,其中既有江浙人、广东人、东北人,也有云南、贵州、四川和重庆本地人。于是,一些江浙味、广东味和本地江湖小饭馆应运而生,茶馆一直开到江边,银行、邮电局、商店、子弟学校遍布在厂区外,形成一个欣欣向荣的集镇,比当年的江北县城还热闹。江对岸的大兴场原为三日场,很快变成天天赶场,农副产品购销两旺。

1939年,日机开始对重庆实施大轰炸,“50厂”从当年到1941年,在铜锣峡北岸峭壁下,一字形开挖22个长方形山洞,将瞄准器等精密仪器车间、材料库房迁入洞中。

据当年的《中国工人》杂志报道:“我们试游江畔,便觉得人烟骤增,机声聒耳。看见数百家内迁工厂,正在平地建造。有的正在开工制造,其奋发努力,犹如前方战士在战场。”文内所讲的数百家内迁工厂,自然包括“50厂”。为保密,“50厂”未公开。

4 人才荟萃 共铸辉煌

“50厂”第一任厂长江杓的父亲早年闯关东,在京奉铁路沟帮子车站任站长,结识了奉军28师师长冯德麟。冯夫人收江杓为义子,冯家赞助江杓留学德国,可谓恩重如山。冯德麟的儿子名叫冯庸,1925年江杓回国,为回报冯家,一直协助冯庸管理大冶工厂、大冶工业专科学校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东北沦陷,江杓到南京军政部兵工署,因工作能力强,逐渐成为兵工署长俞大维的左右手。

江杓出任“50厂”厂长后不忘旧情,凡是冯庸介绍来的人员,他都接纳。东三省沦陷,冯庸将东北籍民主人士、爱国青年等介绍给江杓。江杓是来者不拒,根据来人专长安排岗位,保存了一批将来收复东北失地的精英。

1940年初,冯庸又向江杓推荐了一位东北老乡阎宝航。江杓安排他任“50厂”福利处处长。阎不坐班,每周从重庆到“50厂”两三次,每次冯庸也来郭家沱,与江杓相聚。其实江杓和冯庸都不知道,阎宝航是红色特工,借助“50厂”处长身份,为长期潜伏和搜集情报奠定基础。

1945年8月抗战胜利,根据兵工署制作的《各兵工厂现状调查表》显示,50兵工厂此时拥有职员3890人、机床740台。月产37战防炮2门、60迫击炮200门。

1946年5月,国民政府还都南京,抗战迁渝的工矿企业陆续迁回原地。第50工厂奉命留在重庆,未迁回广东。

值得一提的是,“50厂”以服务抗战为第一要义,为中国战场提供了4000门火炮,为抗战胜利出了大力。随着新中国的诞生,这家兵工厂也迎来了新的变革,它更名为望江机器厂。在抗美援朝那段艰难岁月中,望江机器厂为朝鲜前线源源不断提供武器支持,为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贡献了重要力量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 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中国军队装备的37毫米高射炮



工人正在赶制武器



中国军队装备的37毫米战车防御炮